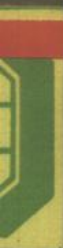


孤独的人群

——美国人性性格变动之研究

〔美〕 理斯曼、格拉泽、戴尼 著

● 刘翔平 译 ● 辽宁人民出版社



孤独的人群

——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

〔美〕理斯曼、
格拉泽、戴尼 著
刘翔平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沈阳

David Riesman With
Nathan Glazer and
Reuel Denney
THE LONEIY CROWD

Yale University Press
Fifteenth Printing, 1966

孤独的人群

——美国人性格变动之研究

Gudu de Renqun

〔美〕理斯曼、格拉泽、戴尼著

刘翔平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280,000 开本:787×1092 $\frac{1}{2}$ 印张:12 $\frac{1}{2}$ 插页:2
印数:1—2,62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英辉 英健 责任校对:刘涛

封面设计:杨勇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 7-205-00668-6/C·54

定价:3.65元

译者前言

《孤独的人群》是美国社会学家D·理斯曼在其两位同事的协作下写作的一部遐迩闻名的著作。该书最初是由耶鲁大学“国家政策研究会”赞助、作者所承担的“美国人的性格与交往”的科研计划，作为一种纯学术著作，作者预计出售几千册就相当不错了。但是出乎作者预料，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很快成了纸皮本的畅销书，被誉为“我们时代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脍炙人口的当代佳作”。

（库尼茨编《二十世纪作家》）巴赞教授指出：“《孤独的人群》的成功现象在于，理斯曼不仅进行了描述，而且进行了解释，他从未忘记他生活在所研究的人群中。在他将人们分类之前，他已经感受到了人们的感情并理解了他们的思想。”

理斯曼早年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在学习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对历史和文学更感兴趣。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学，在此期间他自学了经济学、经营管理学和美国历史。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去纽约的精神病院听课，并结识了新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弗洛姆，并随弗洛姆一道工作了几年。这使他认识到了心理分析的重要意义。在为《二十世纪作家》撰写的条目中，他写道：“我的雄心是成为一名‘多面手’的社会科学家，熟悉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理斯曼的经历和著作正是他的这一远大抱负的如实写照。

《孤独的人群》的主题是讨论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及其演变的。在理斯曼之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探讨这方面的问题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就从跨文化的角度研究了民族性格问题，一些新精神分析学家则研究了社会性格问题。理斯曼正是以他们的研究为起点的，从上述两种倾向中，他敏锐地看到了心理分析在揭示社会现象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序言中，他指出：“在写作《孤独的人群》过程中，我们深信历史、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等古老的学科对于理解社会变化已经变得并不特别重要，只有利用心理分析的心理学才能更好地了解 and 掌握社会的变化”。然而，作者认为上述古老的学科对于了解社会现象来说，仍然是基础和不可缺少的。纵观《孤独的人群》，我发现，理斯曼并不囿于用心理分析来解决问题，而是结合了工作、闲暇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大众传播媒介等具体社会现象研究社会性格的。可以说，作者的研究范围远远超出了上述两种倾向。首先，《孤独的人群》的内容不同于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的性格类型学是从个人出发，从而去接近社会，而《孤独的人群》则采用了另一条途径，那就是，我们以工业社会和美国社会的特殊历史发展为起点”。（序言）正统精神分析学家首先关心个案和病例，关心个人生活史，而理斯曼则认为，“若要了解社会，仅仅掌握个人生活史还不够，还需要了解历史”。（序言）依据西方人口的变化和历史的演变，理斯曼对美国人社会性格的类型进行了划分。其次，《孤独的人群》又不同于文化人类学。一些人类学家访问调查了原始部落，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性格进行了比较，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民族性格。而理斯曼则着眼于具体的社会阶层，探讨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性格演变。在理斯曼看来，这

部分人占美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的社会性格具有极大的代表性。不止于此，由于人类社会具有“合流”和走向“大同”的趋势，所以美国中产阶级的社会性格也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问题。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的看问题方法的确是本书的一个特色。总之，理斯曼提问题的方式是心理学的，而解决问题的方式主要是社会科学的。

他的方法主要是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相结合。他有时将文学与自己的题目联系起来，引用了托尔斯泰、乔依斯及儿童文学作品来说明自己的思想。“他的联想渊博无比，想象力尤如宙斯的闪电，令人炫目。”（《二十世纪作家》）他对文艺作品的精僻分析、对现代文艺批评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还是让我们结合该书的具体内容对理斯曼的思想做进一步的介绍和讨论吧！

一、社会性格的类型及其形成

在心理学理论中，对性格的看法基本上可分为两大倾向：一种是行为主义的，视性格为外部可见的行为特点；一种是动力学的，以精神分析为代表，视性格为内部的动机系统，是外部行为后面的隐蔽力量。拿“勇敢”这一性格特性来说，从行为上看，它是不畏艰险、勇于冒险的特征；从动力观上看，它可以表现为多种动机：野心可以导致勇敢，虚荣可以造成勇敢，正义感还可以形成勇敢。重要的是作为行为后面的驱动特点。理斯曼倾向于动力学的观点。他指出：“性格是在或长或短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作用下，个人的驱力和满足需要的结构，即个人用来接触世界和他人的一种‘定

型’。”而社会性格则表示某一社会团体或社会阶级所具有的性格结构，是“团体经验的产物”，为同一文化的大多数人所分有。理斯曼强调，社会性格的实质和核心是个人内部的顺应机制，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社会迫使个人与自身保持一致，并通过家庭、学校等将这一顺应方式或与社会保持一致的结构内化到个人内部。因此，理斯曼“把顺应的方式与社会性格交替使用”。

理斯曼根据人口学的研究，独道地设想了人口增长与社会性格类型的对应关系。他认为，西方历史上整个人口发展规律呈S曲线。S曲线下面表示人口增长很慢或根本不增长，他称之为“人口高度增长潜力阶段”。西方的古代和中世纪社会即属于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青年人占据人口大多数。在这一阶段产生了顺从传统规范的社会性格——传统引导型。传统引导的人按照习惯、礼仪行动，行动的驱力主要是“害羞”。S曲线的中端表示人口快速增加。粮食增产和卫生设施的改善导致死亡率降低和人口爆炸，理斯曼称之为人口增长过渡期。西方的这一时期开始于十七世纪。在这一时期，人的顺应性来自内部的道德规范，故产生了内部引导的社会性格。内部引导的人是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资本积累出现的一代“强人”。他们怀有理想、笃守道德，现代的工业文明主要是由他们奠基的。在S曲线的上端，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有所下降，理斯曼称之为初期人口下降阶段。西方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开始出现这一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已经满足，消费和闲暇生活日益重要。社会需要一种会消费、善交际、留意别人对自己态度的性格类型，这即产生了他人引导的性格类型。

那么，上述的社会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呢？理斯曼同意心理学家的普遍结论，认为性格主要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所以，父母、家庭、学校是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理斯曼从如下几个方面分析了性格形成原因的变化。

第一，父母角色的变化。在传统引导时期，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十分简单，父母并没有去刻意影响和教育孩子，当时，父母的心理与孩子们的差异并不大，孩子性格的形成主要是对父母的模仿。在内部引导阶段，父母往往有意识地约束和督促孩子。他们不仅把自己生活中的心理压力带给孩子，而且强迫孩子按照自己的信念去做。在他人引导的社会，由于“什么是好孩子”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讨人喜欢成了好孩子的重要标准。父母只好把培养孩子的任务交给学校或孩子本人。在这一时期，孩子变得更珍贵了。他们首次对父母的性格具有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教师角色的变化。传导引导阶段几乎没有学校存在，自然谈不上教师对儿童性格的影响。在内部引导时期，学校不多见，教师只关心学业，不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和友谊。师生关系充满了冷漠和仇视，从而培养了内部引导的性格。在他人引导时期，教师都是受过专业教育、善于体察学生心理的青年人。他们不大注意传授知识，而是十分关心学生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生活。这种教育方式有助于培养他人引导的性格。

第三，同侪团体的影响。也许是以一个社会学家的身份看问题，理斯曼十分重视儿童与各类同侪团体（年龄、社会地位相仿的团体）的相互作用，他把这一作用看作性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内部引导时期，孩子们十分缺乏交际能力方面的教育，他们所接触的同伴也都是些与他同样孤僻的

人。所以，孩子们很少来往，顶多只有一两个知心朋友。此外，森严的社会等级和严格的两性隔离也限制了儿童的相互来往。在他人引导时期，父母从小就注重培养孩子的顺应性，孩子们掌握了与其他人相处的艺术。理斯曼认为，这固然使孩子们生活得更和谐和更幸福，但也会使孩子过于重视同侪团体的印象，而不敢表现个人的卓越才能和独特意见。

第四，大众传播媒介的变化。理斯曼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可以通过同侪团体影响儿童性格的形成。在传统引导的社会，大众传播媒介表现为歌曲和故事，社会价值观就是通过歌曲和故事传播开来的。故事既有顺应社会的题材，又包含叛逆社会的题材，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冲突推动着传统引导社会的进步。在内部引导时期，传播媒介主要表现为印刷品。印刷品不仅使人们摆脱了狭隘的地方观念，而且也促进了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树立了牢固的榜样。印刷品（小说和诗歌）描写了许多经商和探险成功的故事。“点燃了内部引导青年的野心、志向和冒险精神，使他们尝试新角色。”

（第251页）在他人引导时期，传播媒介如连环画、小说不仅被设计得更加符合儿童的特点，而且在题材和表达风格上也更加丰富了。许多故事的主题是告诫儿童与他人合作，不要标新立异的。但由于社会关系中存在着竞争现象，因而他人引导的儿童在看小人书时十分关心谁获胜，很少关心主人公内心的道德冲突。理斯曼深刻地指出，这一现象反映了他人引导者对合作与竞争的矛盾态度。

总之，随着父母和教师角色、儿童同侪团体及大众传播的变化，人的社会性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二、社会性格与生活方式

在理斯曼看来，社会性格最终总要体现为一定的生活方式。理斯曼通过比较内部引导者和他人引导者工作和闲暇生活所具有的不同意义，使其社会性格类型学更加具体化。

内部引导者试图根据非人情味的目标看待工作，强调生产的技能和智力过程，他们确立工作的长远目标，力争出人头地。而他人引导者则根据人性来考虑工作，重视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公平合作和操纵人的技巧，与同事采取有敌意的合作。相比之下，理斯曼更注重闲暇态度的转变，内部引导者以工作为主，把娱乐当作次要的。只要工作有意义、事业顺利，他们的生活就充满乐趣。而他人引导者不仅讲究娱乐，而且把娱乐当作结交朋友的手段。在娱乐中他们玩得很开心。在他人引导的社会，从饮食、爱情、性生活都与内部引导时期有所不同。理斯曼对闲暇生活的强调引起了一些争议（见序言）。

三、社会性格与政治生活

美国人有一种嗜好政治的传统，如果一个公民被指责为只顾自己的事不关心公共政治生活，他就会感到格外痛苦和空虚。所以，在理斯曼看来，考察美国人的性格变化，不能不考察他们的政治态度的变化。

（一）不同社会性格对政治的不同态度

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理斯曼把美国人的政治态度分为三种：政治冷漠者、笃守道德者(moralizer)和内幕消息

预言者(inside-dopester)。冷漠主要是传统引导者的政治态度。理斯曼按照历史时代把政治冷漠者又分为二种类型：第一种是古老的政治冷漠者，是指古代或中世纪那些被剥夺政治权力的人，如古希腊的奴隶、中世纪的妇女，他们没有发表政治主张的机会，也不知如何从事政治。第二种是指近现代掌握了一定文字和组织能力、了解基本政治工具的冷漠者，包括某些内部引导者和他人引导者。由于美国生活富裕带来安全感和现代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这些有文化的人有意逃避政治。

笃守道德是内部引导者典型的政治风格，其最大特点是把工作的态度带入政治生活中。理斯曼指出：“内部引导者把全部的情感和才能花费在工作上。所以，当他处理政治问题时，习惯于采用处理工作问题的方式。当听到政治消息时，他注意里边有什么任务，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或运用自己的知识了解其真正含义”（第446页）。他们参与政治不是出于维护道德观点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因此，他们对政治十分认真，参与政治活动时具有强烈的情绪色彩。理斯曼按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兴衰，把笃守道德者又分为得势和失势的两种类型（详见第八章）。

在二十世纪，美国占主导的政治风格是“内幕消息预言者”的态度，这也是他人引导者具有的典型的政治风格。内幕消息预言者把消费生活的态度带入政治，对他们来说，政治是一种嗜好，“是一种社会角色的实现，也是一种有趣的游戏，一桩好买卖和一种有趣的接触方式”（第476页）。因而与经济利益和个人需要无关。他人引导者加入政治活动的主要动机是探听内幕消息，接触上层人物，扩大交际范围。由于将政治与个人利益截然分开，他们善于克制自己的情绪

冲突，对政治问题持宽容态度。此外，他们有清楚的政治头脑，深知自己不能改变政治局势，所以随时准备迎合政治局势的变化，改变政治立场。

由于他人引导者把消费生活的态度带入政治，而大众传播媒介又是培养消费技巧的主要途径，因而，大众传播媒介对他人引导社会的政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二）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对政治的影响

作为他人引导者与政治之间的联系纽带，大众传播媒介赋予政治生活某些新特点。理斯曼专门用一章讨论了这一问题，现概述如下：

第一，大众传播媒介使他人引导者把政治当作一种供人观赏和享受的“消费品”，一种比赛和娱乐。大众传播媒介为政治活动发明了一种特效药——魅力，政治家若想获得成功、得到人们的注意和关切，必须具备魅力，必须有时髦的外貌、诚恳等。旧式的才干、壮举均已过时了。

第二，大众传播媒介培养了政治上的宽容精神。在他人引导时期，大众传播媒介常常面对着各类政治团体的压力，并担心是否冒犯听众和观众，因而极力宣传宽容精神，宽容的态度使听众不注意传播媒介所表达的内容，而是注重其表达的诚意。

第三，虽然大众传播媒介总体上培养了他人引导的宽容精神，但由于美国新闻出版界仍遗留着内部引导的笃守道德的政治风气，所以，政治上宽容精神有所减弱。报刊杂志为了赢得好名声，往往宁愿赔钱也要刊登政治新闻，传播狭隘的政治情绪。由此可见，在他人引导的社会，对于笃守道德者的势力不可低估。他人引导者太重视他人意见，政治上常常是软弱的。

（三）权力形象的变化

理斯曼认为，随着美国政治风格由笃守道德转向内幕消息预测以及大众传播媒介对政治的影响，美国的权力形象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政治权力由集中走向分散。在内部引导时期，美国政治权力集中在少数金融家、产业大王手里，他们高高在上，形成了统治阶级。这些人笃守道德规范和政治信念，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领导意识。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领导别人。而在他人引导的社会，政治权力由众多的否决团体所分担。否决团体是对政治议案可行使否决权力的社团，包括商人团体、工人团体等。理斯曼认为，否决团体创造了无固定形态的权力，使人们很难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使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差距大大缩小了。

第二，政治家由注重工作走向注重魅力。内部引导时期的政治家把工作的态度带入政治，对待政治热情、严肃、刻板，他们追求辉煌的政绩，有千古留名的野心，因而不怕冒犯大众。在他人引导时期，消费领袖如艺术家、演员等取代了产业领袖成为公众注意的焦点。政治领袖纷纷仿效消费领袖的特点，注重自己的魅力和公众的舆论，注重选民的态度和反应。

综上所述，理斯曼认为，无论美国人的政治态度、权力的分配，还是政治家的行为标准都趋向于他人引导化的方向，尽管笃守道德式的政治力量还有一定市场，但整个社会条件对于它十分不利。

四、从顺应到不顺应：人的自主性

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理斯曼用大部分篇幅阐述了顺应社会的性格类型，典型的传统引导、内部引导和他人引导型都是顺应良好的性格类型。它们能够正确反映现实、顺应文化的要求。如果社会不发生动荡，这些性格类型均能在社会生活中找到可靠的安身之地。在第三编，理斯曼的视线超越了对社会环境的顺应，转而讨论了人的自主性问题。如果说顺应性是指社会环境对人的塑造以及人对社会要求的反映，那么，人的自主性则体现着人对社会环境的选择和超越。由于理斯曼把社会性格的本质理解为对社会的顺应，因而自主性问题已经超出了社会性格范围，它包含着理斯曼对未来的预测及其社会理想。

（一）自主性

理斯曼认为，总体上说，社会环境决定社会性格，但社会结构是复杂的，总能“容纳各种社会因素的不协调，所以，也能容纳个人对于不同顺应方式的选择”（第608页）。复杂的社会条件可以造就两种人，一种是顺应社会的人，另一种是偏离社会的人：

顺应者
传统引导型
内部引导型
他人引导型

不顺应者
自暴自弃者 (anomic)

自主者 (autonomous)

自暴自弃者实质上就是顺应不良的人，他们不遵守社会规范，不能约束自己。他们不是不能正确认识环境的意义，就是表现出冷漠的情绪。自主者则是在总体上能顺应社

会的行为规范，不象自暴自弃者那样顺应不良，但他们可以在顺应社会规范或不顺应社会规范之间进行自由选择”（第612页）。他们有良好的判断力和卓越自我意识，有能力超越千篇一律的行为规范，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

自主性的产生要有许多条件，理斯曼认为，就一般条件来说自主性与遗传和社会发展水平有关。首先，遗传素质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各种能力，婴儿出生时就已存在着个体差异了。其次，社会的发展水平更加重要。第一，社会只有到了人口增长过渡时期，人类有可能“了解自己可以选择多重角色，可以在历史和环境中选择他人担任的角色之后”（第621页），自主性才可能产生；其次，当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有闲暇时间提高自身的素质、丰富个人经验之时，自主性才有可能产生。具体地说，内部引导时期和他人引导时期，人的自主性产生条件和表现方式又有所不同。在内部引导时期，自主性的条件较为明确和充分，譬如社会对个人心理控制较为薄弱、便利的迁移及财产等，都可为人的自主性创造实现的机会。在这一时期，只要一个人能够以理性作指导，自觉地选择和实现个人的目标，就可算是一个自主的人。在他人引导阶段，自主性则变得不易规定。理斯曼对此似乎没有充分的把握，他只是带有假设地指出，“今天，自主的人必须不断努力摆脱极端他人引导的阴影”（第647页），自主性是“与流行的顺从方式斗争的结果（第649页），实际上，理斯曼试图通过指出什么是自主性的反面——即自主性的障碍来规定自主性。

（二）工作中自主性的障碍

在他人引导时期，若想真正实现对环境的选择，必须克服许多工作上的自主性障碍。理斯曼认为，现存的美国文化

把工作定义为结交人和讨好人的事情。并认为工作是最重要的，无论人愿意与否，对工作都必须兢兢业业，受纪律约束，这使一些人厌恶工作。在工作中，他人引导者常故意虚伪、做作地向人谄媚（理斯曼称之为错误的人格化）。譬如白领职员追求个人魅力、经理过分注重讨好工人及经理自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人物等，这些错误的人格化不仅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情绪能量，而且也使工作染上了过重的情绪色彩，因而妨碍了人们在工作中认识自己的需要和个性，不利于实现个人潜能。为此，理斯曼建议，要加速自动化过程，充分利用生产和分配中的非人格化因素，使人们能够撇开纷乱的人为因素，正视工作过程本身。

（三）娱乐中自主性的障碍

理斯曼认为，在闲暇娱乐生活中，自主性的障碍之一是强制性，即社会强制剥夺人的社交和娱乐，理斯曼称之为强制的剥夺（enforced privatization）。

对于他人引导者来说，工作中过分注重社交即是错误的人格化，构成自主性的障碍，而在娱乐生活中，社交不够或剥夺社交则同样是一种自主性的障碍。理斯曼论述了各种社交受剥夺和娱乐受剥夺现象：第一，他人引导的儿童有可能在选择朋友方面受妨碍，由于同侪团体和父母常常为其提供择友标准，他不能按照个人心愿选择朋友，而是压抑个人心愿，这无疑是对自主性的妨碍。第二，穷苦的下层阶级因经济收入原因无法加入各种社交组织和娱乐活动，只能机械地生活。第三，妇女们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在娱乐和交际方面仍受一定的剥夺。一方面，不少男人限制妇女的交际，不让她们外出工作；另一方面，一些业余活动已经专业化，使妇女闲暇活动的范围大为减小，使工作的妇女很少

在闲暇中发现生活的乐趣。第四，种族隔离、文化歧视限制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社交范围及其娱乐生活，使他们不能尽情地享受闲暇生活。

娱乐中自主性的另一障碍表现为娱乐能力的损害。在内部引导时期，清教禁欲主义使人们觉得娱乐和消费是为了工作，若要享乐，必须更加勤奋工作。这使人们在娱乐时不能心安理得。这一阴影仍影响着一些他人引导的人。在他人引导阶段，某些人能够摆脱禁欲主义的阴影，尽情投入娱乐，然而，他们在娱乐中过分顾及人际关系和同侪团体的态度，因而压抑了自己的个性。此外，随着娱乐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使许多人对娱乐活动不敢问津。

理斯曼指出，他人引导时期的大众传播媒介鼓励消费，强调娱乐，为人们在娱乐中实现自主性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在其影响下，一些人业余时间搞些小发明、动手从事技艺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人的自主性。但理斯曼提醒人们，在技艺活动中也出现了标准化、专业化的趋向，这种趋向可能损害技艺活动原有的娱乐性和自发性。因此，理斯曼由技艺活动转而论述人的爱好问题，他认为“他人引导者只有通过与他人交换好尚并超越这一交换才能获得自主性”（第738页）。在交换彼此的爱好过程中，一些他人引导者常常评论爱好的优缺点，反对流行的标准，从而提高了批判能力。理斯曼指出：“好尚交换过程终究会超越自身，成为与好尚不同的事物，好尚的交流有助于他人引导者的自主性（第743页）。最后，为了克服娱乐中自主性的障碍，理斯曼提议，要多多培养业余生活顾问，使其为闲暇生活提供指导。

（四）自主性与乌托邦

理斯曼认为，在现阶段，克服自主性的障碍和确立自主